

“大编”徐勇

新华社同事忆徐勇生前点滴



编者按：2019年11月20日，新华社国际部高级编辑徐勇在位于北京的办公室中因突发心梗去世，享年56岁。11月22日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办公室向新华社办公厅发来慰问信，对徐勇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。

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，徐勇对文字近乎“洁癖”的讲究，影响了每一个被他骂过，更被他温暖过的同事。“冷眼风云臧否人物一腔热血谁笑付 妙手文章桀傲风骨半幅肝胆可问天”——这是同事为他而作的挽联，没有他“忌讳”的副词，没有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，但愿能配得上他的潇洒和准确。

“种下一团火，散作满天星”，我们再次刊发回忆徐勇的文字，怀念一枚点亮新闻理想的火种……

杨舒怡

徐勇走的那天，他没来得及改我的稿子。

去世前一天，他改我一条短稿，成为给我的临别礼物。我写“仅仅1个小时后就匆忙离场”，他删去“仅仅”“就”。我把编辑系统里的留痕模式印在脑中，此生不忘。除此以外，再说什么都是多余。

徐勇是新华社国际部专特稿专线新闻采编中心灵魂人物，是我们的师傅。被他训得羞愤欲死、骂得肝胆俱裂，谁还没有过？编辑说写写他的业务洁癖、工作作风，可我怎么敢写呢？总觉得没有一个句子配得上他的纯粹和精准，就像他如往常一样站在背后看我们敲字，不时“哼”一声冷笑，再看几句便要大声咆哮起来。对不起，删去“大声”——咆哮不会小声。

徐勇常挂在嘴边：“肯干比能干重要。”做事全力以赴，何尝顾惜身。

有人说徐勇有文字洁癖，这我不知道。只知道：是是，否就是否，拒绝含糊，拒绝废词。“富婆”绝不说“女富婆”（你听说过“男富婆”吗？）；“河上漂死鱼”绝不说“河上漂着鱼的死尸”（还“鱼的死尸”？你想干嘛？）；报道坠机事件时，“机上乘客”删去“机上”（有“机下乘客”吗？）；某地某时遭遇爆炸袭击，造成2死4伤，删去“造成”（语义清晰，何必啰嗦？）；“中枪”？（你确定不是“中弹”？）；“透露”？（玩什么故弄玄虚，难道不是正常披露信息吗？老老实实改成“说”）。

徐勇教我对文字不能轻慢，每个字都有含义，想清楚再用。“某国总统某日宣誓就职”，想也不想就写“宣誓就职”么？真有一次，牵涉某国政坛角力，我们敏锐捕捉到只有“就职”却无“宣誓”，种种暗流涌动蕴含在一词中。

读到稿中“匿名消息人士”云云，他叫我们思考：真是匿名人士么？记者必定知道消息人士身份和职称，否则怎敢以不靠谱之人作为消息源？于是改成“不愿意在媒体报道中公开姓名的某国官员”，精准。

徐勇不允许我们想当然。总要去源头（source）核实，拒绝二手消息。哪怕是自己的已发稿，也不许作为依据，仍要回



归源头。对自己所作所为负责，甚至连源头也不盲信——别人出错，不是我们出错的理由。

我在埃及中东总社当过两年英文编辑，没敢忘记他的训诲。有一次处理某分社发回的英文消息稿，提到某地震所在城市和经纬度。我去核地图，发现经纬度坐标位于红海，并非稿中所提人口稠密城市，可见两者必有一个写错。我追问当地雇员，答曰城市和经纬度这两个信息均援引自该国地震局网站。然而，地震局写错并不是我们写错的理由。继续寻找真相，直到确定无误。

徐勇要求大家保持专业精神。比如，文中第一次必须用全称，“贝拉克·奥巴马”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”等，后文才可简称“奥巴马”“北约”。他执着到连“超市”首次出现也用全称“超级市场”，好吧。

我们跟他学习：力求精准，不计代价。今年报道巴黎圣母院大火，有一个细节是“spire”倒塌，我在稿中译作“尖塔”倒塌。后来有报纸用户询问，其他稿件称“塔尖”烧毁，到底是“尖塔”还是“塔尖”？我早做足功课，答复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《蝇王》作者威廉·戈尔丁写过一部小说“The Spire”，中文译名《教堂尖塔》，又详述其建筑特点，证实区别于“塔尖”。几天后，徐勇见我时颇有称许。不记得他的原话，大意是：理当如此。

徐勇讲究品位，爱送大家CD和鲜花，自诩“old school”（老派）。他喜欢Josh Groban、Hayley Westenra、Roberta Flack、James Blunt……组里的年轻人谁没听过他分享歌曲《Wind Beneath My Wings》《You Raise Me Up》呢？

我后来渐渐体会到，他所追求的格调和胸怀，对写稿有何等深刻影响。先做人，再做事。不知道的人只看到他对稿件吹毛求疵、精益求精，却不知他始终在意的是人。人之为人，人比事重要。满腔热诚，满腔悲悯。于是明白，这样一个痛恨废字的人，当年为何没把我一篇稿件中“狗狗”删成“狗”。那是喀布尔分社遇袭时，记者张宁在前方连线口述、我在后方记录，提到爆炸现场“一只小狗狗”。徐勇编辑时愣了一下，没有敲删除键。

新闻追求速度。徐勇催逼下，我老早知道写稿标准：30分钟内写三五百字，1个半小时内完成千字稿。时效压力下，新闻稿不容我们像作家一样从容斟酌，慢条斯理。每条

稿子，都是在有限时间内匆忙赶出，都火急火燎得没时间喝水上厕所。徐勇教会我们，在有限时间内尽最大努力；一旦发稿，便不再懊悔纠结，为某个瑕疵而百爪挠心，只要下次再拼尽全力，就可以了。

所以，这两幅画面都真实：徐勇破口大骂，把我们训得痛哭流涕；他柔声劝慰，说“知道你尽力了”。

徐勇的悲悯，除了捐钱助人之类，同样藏在稿件里，藏得有些深，要细品才知。我上学时爱写得晦涩难懂，人职后才知写得“够简单”才是高手。往往素材越难、事件越复杂，需要作者多做几倍功夫，自己吃透，才能写得让读者“读得容易”。徐勇教我们，这是为人做事的态度。

徐勇总鼓励我们写稿分小标题，那是出于对报纸用户的服务意识，方便报社编辑剪裁、重组，也方便读者一目了然，脉络清晰。

采写国际新闻，忌讳生硬翻译。中西文化差异，语言习惯不同，关注点迥异。徐勇教我们按照中文写作习惯、逻辑思路采写稿件，遇到某些舶来词不吝多介绍几句，交待清楚，总要让人读得明白，否则就是作者自娱自乐。

有个例子是“great”。英语世界张嘴闭嘴用这个词，我们若统统译作“伟大”，徐勇便嗤之以鼻：世间有多少人或事当得起“伟大”一词？读过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（The Great Gatsby）么？更多时候，外国人口中的“great”是指“了不起”。

跟徐勇干活，慢慢学会用巧劲儿。背景材料不要堆作一团，可以打散后穿插全文，犹如穿针绣花；直接引语善加利用，如何放置在文中各处以增现场感和兴味；每个字、每个词皆有作用，想清楚为何写、如何写，哪有废笔？

徐勇教太多，我匆匆几笔怎写得完呢？最后，讲一件趣事。当年，我们故意设计一个句子打算气徐勇，妥妥的是“琼瑶style”：“让我告诉你，我是爱你的。”前半句是废话，可删；后半句“是……”是徐勇最痛恨句式，想象着他一边咆哮一边删成“我爱你”。设计归设计，终究没敢对他说。

徐勇走后，悲伤袭来，纪念他的文章铺天盖地。感谢新华社国际部法文组刘锴，他在《品味——写给徐勇》文末，终于把那句话对徐勇说了。

徐超

“……没有认识到自身所受局限性”，删除“性”。

这是徐勇11月20日午后改动的最后一个文字表述。我编辑的特稿《专家推测美放弃对欧洲汽车加征关税》，不幸成为他生前改写的最后一篇特稿。没有改完。

编辑系统留痕模式中，特稿“花脸”只有不到两个小标题，余下部分一字未改即提交。依惯例，没有哪篇稿子能连续几段在徐勇那里“全身而退”，并且稿件一旦由他编辑锁定，不改彻底不会提交。也许，提交那一刻，他已无法完成这篇特稿的改稿任务。

内心愧疚。耳提面命十几年，能改的毛病都改了么？没有，总有新的不规范之处成为他的标靶。

“贸易法专家认定……”，“认定”改“推断”；“根据××条款，美商务部有权……”，“有权”改“可以”；“对进口商品采取(贸易)行动”，“贸易”改“关税”；“帕卡德认为”，“认为”改“说”……

专特稿人记忆中，文字表述尽可能具体、达意、客观、平实，也许是徐勇一生坚持的新闻标准。不少人逐渐放弃坚守，他却在嬉笑怒骂中继续前行。

徐勇追求细节。

一次和徐勇一道上大夜班，一名荷兰亿万富翁之女遭绑架两天后获释，我得素材不多，不打算写。徐勇反问“不多吗？”自己动手来，1个小时，抓取外电有限素材中的“光脚脱身”“嫌疑人动机”“媒体报道争议”新闻点，辅以家人激动反应、过往案例背景、富翁资产链接，妥妥整出1300字特稿。没一句废话。

另一位同事初识徐勇，写两位领导人当选后互致贺电，只表达“打电话祝贺”。徐勇提醒，应沿用英文报道中用的cellphone（手机）一词，因为不是办公电话，显示出双方互动“个人化”。

徐勇讲究准确。

一位女同事刚入社时，写动物园的大千世界。徐勇坐一边默不作声盯着编辑过程。写到“工作人员用麻醉枪shoot down一头熊”，同事纠结，“击毙”“打死”不准确，“打倒”肯定不符合他的标准，最后战战兢兢敲下不太书面的“放倒”，徐勇拍案而起：“不错！You are good。”然后拉开椅子走了。编辑顿觉鸟云散尽。

每次碰到底稿在稿件中打出“大选”一词，徐勇会质问“真的是大选吗？”大选英文是General elections，复数形式，同时包括总统、议会、地方选举。因而，真正可叫大选的不多，美国总统是一例，因为那天同时举行总统选举，还有州长、国会参众两院的改造。其他多数选举，只能具体称作“议会选举”“总统选举”。

徐勇看重简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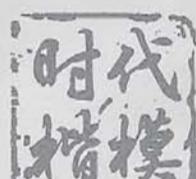
表达同样的含义时，短句往往更有力，因此能删的表述尽可能删掉。“性”“进行”等措辞含义过于空泛，一直是专特稿“禁区”。“自杀性袭击”一般要求改为“自杀袭击”或“自杀式袭击”。

这条稿由此成为徐勇经典授课案例，至今印象深刻。副词多，语句就会失去应有的力量。

徐勇不忘担当。

时时刻刻，徐勇敬畏文字，深知一字之差可能带来报道安全隐忧，也一直在专特稿承担现有编辑流程外的另外一道安全阀。他在文字上的“洁癖”，堪称新华社乃至新闻人的一种本分。

徐勇改的最后一篇稿



中宣部宣教局
人民日报社

本报记者任会斌、安路蒙

她叫刘美贤，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一名乡村教师，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坚守初心一辈子，患肝癌去世时年仅54岁。她终生未婚，以校为家，视学生如己出，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，在当地百姓心中树起一座精神丰碑。

刘美贤9岁丧母，性格内向，却非常热爱学习，教师是她儿时向往的职业。后来，靠着伯父的资助和勤工俭学，她相继取得高中和大专学历，1984年被白大路民办小学聘为教师。

20世纪80年代的白大路民办小学，只有三间土坯房，其中两间作为教室，剩余一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。刘美贤为了备课、批改作业和自学，常常熬到深夜，晚上在凳子上支块木板，就睡在办公室里。

就这样，在白大路民办小学工作的十几年里，刘美贤一直以校为家。“当时，她一个月工资40多块钱，按说生活有保障，可她的工资基本都花在修教室和资助学生身上了，她自己省吃俭用，天天吃土豆、杂粮充饥，衣服破了补补接着穿，日子过得像苦行僧。”刘美贤的生前好友邬丽回忆。

“她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今年39岁的个体老板李明，是刘美贤在白大路民办小学时教过的学生，因父母残疾，该上学时，李明家里连几毛钱的学费都掏不出。刘美贤知道后，年年替他交学费、买书本，一直到他小学毕业，期间还经常带着学生们去他家打扫卫生，担水、扫地、刷锅、洗碗……

“30多年过去了，每次想起来，心里都挺感激她，没有她，真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如今的李明事业有成，已经搬去鄂尔多斯市区发展。

1991年，刘美贤成为白大路民办小学的校长。当时，学校只有三间透风漏雨的土房，她舍不得雇人修缮，自己冒着暑热脱土坯、砌墙、抹灰。修教室、助学把工资花光了，她就在周末去收酒瓶，烂烂挣钱。

“她待学生，就像亲妈一样！”白大路村村民陈满喜回忆说，刘美贤几乎天天为成绩差的学生补课，天黑后她会提着马灯，翻山越岭送孩子回家；每逢下雨下雪，她就把一些离家远的学生留在学校住，那会儿卫生条件差，孩子们身上虱子多，她不嫌弃，为他们洗衣服、做饭、辅导作业。

校长、老师、炊事员、档案员……曾任巴润哈岱乡教育办

公室主任的刘培荣说，在白大路民办小学，刘美贤身兼多种角色，春节都留守在学校，真正是以校为家，对学生的爱真正体现了教育的灵魂。

准格尔旗优秀党员、鄂尔多斯市优秀党员、全国优秀教师

，执教期间，刘美贤获得过很多荣誉，但她依然本色不改。去世前一周，她拿出仅剩的1万元积蓄，捐给了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纳章街道竹园小学的贫困学生。

「妈妈校长」——烛照后来人

追记全国优秀教师刘美贤

准格尔旗第一位捐献遗体的人

1986年，刘美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多年来，她珍视自己的党员身份，虽然各种荣誉加身，但她一直过着节衣缩食的清贫生活，连一套自己的房子也没有。1999年调到原巴润哈岱乡中心小学后，办公室住不成了，她就在校外租房子住，直到2016年被干女儿郭艳丽接回家。

刘美贤事事不求索取，热心参加助学、济困、扫盲等公益活动，还经常利用自己的摄影特长，帮别人拍照录像。“她是个工作狂，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，长期操劳过度，把身体透支了。”刘美贤的干女儿郭艳丽痛心地说，去年一次体检时，刘美贤被查出肝癌晚期。

患病后，刘美贤没有恐惧死亡，也不怨天尤人，而是开始认真思考：如何回报党和政府、社会对她的关怀。今年5月16日，她亲自填写了自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，成为准格尔旗第一位捐献遗体的人。

“起初我们都反对，她不厌其烦地讲自己的想法，最终说服了我们。”干女儿郭艳丽流着眼泪告诉记者，刘美贤生前总是说，自己泡在苦水中长大，能成为一名高级教师，过上今天的生活，离不开党和社会，“挣了一辈子共产党的钱，能将遗体留作医学研究，也算对得起党和政府的栽培”。

今年7月17日，刘美贤因肝癌医治无效，离开了人世，年仅54岁。家人遵循她的生前嘱咐，将她的遗体无偿捐献，用于国家医学教学和科研事业。

燃烧一个人，照亮一群人

刘美贤有先天的生理残疾，终生未婚。1992年，12岁的郭艳丽因家庭经济困难，面临辍学，刘美贤知道后，一直资助她到高中毕业。后来，没有子女的刘美贤将她认作干女儿。“她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，她的品德也影响了我们这些身边的人。”想起刘美贤的点滴关怀，郭艳丽泪如雨下。

刘美贤查出肝癌后，郭艳丽便辞去工作，全身心地照顾母亲，丈夫王亚军主动拿出工资卡，到处求医问药，前后花费20多万元。前两年，一位熟人曾请求刘美贤帮忙，以她的名义在当地信用社贷款10万元，没想到还款期快到了，熟人却想赖账，这件事是刘美贤生前最担忧的事。“不能坏了母亲一辈子清清白白的名声，这笔钱要是追不回来，我们会替母亲把钱准时还给信用社。”郭艳丽说。

郭艳丽的女儿郭新星今年14岁，在刘美贤的言传身教下，也热爱公益，梦想长大后当一名教师。“姥姥是我最敬佩的人，教师这个职业虽然平凡，却也非常伟大。”

患病前，刘美贤最大的愿望是去贫困山区支教，因病未能成行。为了替干姥姥达成夙愿，郭新星主动报名去云南曲靖市的贫困地区支教。

郭新星在本子上写道：“她教育出的孩子走出村庄，在城市中生根发芽，落地开花，社会造就了她，而许许多多像她这样的人造就了如此美丽的社会。作为她的亲人，我必将把这份精神发扬光大！”



2019年8月10日凌晨，超强台风

“利奇马”突袭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荆州乡。时任该乡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的李夏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不幸遇难，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。

基层青年纪检监察干部的优秀代表

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荆州乡原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

李夏

